

拉丁美洲政治研究的學思歷程

蘇彥斌*



榮幸獲得科技部本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是我學術生涯起步階段的一個里程碑，而伴隨著順利升等，更可說是雙喜臨門。除了感謝科技部審查委員肯定我的研究成果，也要感謝科技部支持我的專題研究計畫，讓我得以從事國內較少學者鑽研的拉丁美洲政治領域。

從 2014 年至今，我在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Party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等學術期刊發表過以拉美政黨體系發展為主題的研究論文，並且曾在 *Comparative Politics* 發表論文，以全球民主國家為分析樣本，探討政治制度與政黨對於社會抗議的效應。而我在國內期刊所發表的論文，則以臺灣的政黨政治與社會抗議為研究主題，試圖對於臺灣政治與社會變遷過程提出不一樣的觀點。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與拉丁美洲研究結緣，始於我在 1999 年到厄瓜多遊學。當時適逢該國七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厄瓜多幣匯率極為不穩，政府採取嚴格措施抑制擠兌，而長期以來深受貧困之苦的原住民則發動大規模抗爭運動，數以千計的原住民長途跋涉湧進首都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回應其訴求。我在剛抵達厄瓜多且離開機場不久後，隨即因為「安全」的考量，在友人的建議下待在住處兩天無法出門。那兩天在電視上看到警民激烈對峙，讓我覺得似乎與臺灣民主化運動有不少相似之處，從此讓我對拉丁美洲產生濃厚的研究興趣。回國後，只要有機會，便刻意選擇與拉丁美洲相關的主題撰寫課堂作業與期末報告，這樣的研究動力一直延續至今。

我大一念的是臺大哲學系，後來在大二轉系至政治系。雖然只受到短短一年的哲學訓練，卻對我的治學態度產生不小影響，例如時常提醒自己要保有胡適先生「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的批判態度，以及作研究時要盡可能秉持考量多元觀點的開放立場。在目前的政治學界，主流的研究主題大多與政府體制相關，許多研究者更是直接站在政府的立場思考。對此，我謹慎以對，主要是受到恩師莊錦農的影響，同時也受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有關。他在寫給兒女的訣別信中提到：「最重要的是，永遠要有能力去深刻地感受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發生在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不正義。」讓我深受啟發，也因此，我從社會運動與抵抗政治的角度撰寫關於墨西哥民主化的碩士論文。在撰寫論文期間，由於當時網路資訊尚不發達，圖書館的西文文獻也不足，我還曾透過外文系張淑英老師居中牽線，請求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 Guillermo Salas-Banuet 教授幫忙將所需研究資料寄到臺灣，以便讓論文的內容更加完整，不會只拘泥於英文文獻和中文文獻的觀點。

2006 年負笈美國匹茲堡大學攻讀博士班，專攻比較政治和政治行為。有趣的是，由於匹大政治系恰好曾訓練出不少「亞裔拉美專家」(Asian Latin Americanists)，也因此讓我如魚得水，得以順利鑽研拉美政治，不像許多在美國念比政的臺灣博士生常「自然而然」或是「被迫」以亞洲國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然而，我研究拉美並不是想要成為拉美人，其中最重要的學術動機，是想要透過對於這個區域新興民主國家的比較研究，進而對於臺灣的政治發展提出有意義的參照與啟發。

近三十年來，美國主流政治學界極為重視實證方法的訓練，使我在美國近八年的求學過程中受到強烈衝擊，險些被「洗腦」成對於質化研究不屑一顧的「科學家」。幸運的是，在共同指導教授 Dr. Scott Morgenstern 與 Dr. Aníbal Pérez-Liñán 的悉心指引下，除了擴大我在拉美研究領域的視野，更讓我時時刻刻警覺不要落入過度重視科學主義的偏差，在研究時仍需秉持具批判性格的反思態

度。這樣的立場，具體反映在我的治學模式。

如果說實證量化分析的目的是為了要檢測理論因果效應的方向與大小，那麼實地研究的目的，則在於探知理論的因果機制。在博士論文寫作期間，我曾赴墨西哥與秘魯進行實地研究，試圖了解統計迴歸係數背後的理論意涵與運作機制，對於理論的修正以及寫作時的推論與補充，都有不少的幫助。在正式進入學界後，我則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持續赴拉美進行實地研究，包括哥倫比亞（2015）、哥斯大黎加（2016），以及巴拿馬（2016）。

量化實證研究要倚靠的是扎實的科學方法訓練、嚴謹的研究設計，以及禁得起檢驗的推論分析，而實地研究，除了需要對於當地的時空脈絡有基本的認識，更需要資源與運氣。由於我的研究主要採取量化分析方法，輔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質化研究，也因此，實地研究雖然在我的研究計畫有一定的重要性，卻不用像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要在田野地至少待上一年半載。在此野人獻曝，與政治學研究者分享一些關於短期實地研究的心得。

首先，在時間和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實地研究的行前準備就顯得非常重要。例如我的研究常常需要與國會議員進行訪談，所以移地研究的行程務必要安排在當地國會開議的期間，這樣才有比較大的機會在國會大樓裡「一網打盡」各黨議員。在住宿的安排上，則可透過有信用的網站預訂位於國會附近的民宿，當然也得考量交通、安全與生活便利性。另外，也得對於當地人際互動的文化有若干認識才行，例如：訪談的邀請信寄出後，若沒得到回應，大約要隔幾天再寄一次會比較妥當？若受訪者在會面當天遲到，要隔多久打電話提醒會比較妥當？

其次，短期實地研究有不小的時間壓力，預約訪談會面勢必要有效率。就我的經驗而言，大多數拉美受訪者若直接看到外國學者的 email 邀訪，通常是直接忽略，就算是到了當地再打電話邀訪，仍不易成功。因此，我建議一定要在當地找到學界的朋友，並請他（她）引介研究生，聘請擔任規劃行程的聯絡人與隨行助理。我在 2015 年哥倫比亞的實地研究，就很幸運聘請到一個得力助手，透過他的議員助理朋友，使我們得以直接進入參議院休息室「守株待兔」。兩天之內，計有 15 位參議員被我這個當時可能是哥國參議院內唯一的亞洲人訪問！能有這樣的高效率，除了感謝我的臨時助理之外，當然也有一些運氣成分。

總而言之，獲獎固然帶來成就感，更是讓我持續維持研究能量的鞭策。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也希望這次獲獎能為研究比政的臺灣學子帶來一些鼓舞，縱使研究領域並不熱門，但只要充實專業學術訓練，勤於寫作並勇於投稿，就有機會樹立專屬的學術「品牌形象」，在學界占有一席之地，進而對於知識的拓展貢獻綿薄之力。